

中國的戰略探求與 轉變中的美國和世界

時評

一 後金融危機時代的戰略探求 (2008-2012)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首先在美國爆發，繼而迅速蔓延到除中國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美國與以其為首的西方由此愈益顯著地相對（即使並非絕對）衰退。在此背景下，急速崛起的中國開始進入它真正的歷史大階段。自此以後，中國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在中國以外的人們看來更是如此：

一、一個巨型的民族國家。經濟、金融和軍事實力急劇增長，在多個國力、國勢領域已經或接近擁有世界第二強地位，並且寓於一種與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更為中央集權化，因而往往也更高效的國內權力體制和操作機制。

二、一個依然面對巨大、多樣和複雜的國內挑戰，但現在更為關注對外事務和對外部世界影響的國度。除了因為國內經濟必需、對「地緣政治戰略權利」的追求和作為一大強國對民族國家光榮的更強烈想望，也因為高揚的大眾民族主義和「勝利主義」（triumphalism），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裝部隊。

三、一頭「重新覺醒」的東亞雄獅。自2012年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習近平掌握了與三位前任領袖相比集中得多的權力。習近平堅信中華民族須有亦可有偉大復興，就他對中國的大小對手所採取的強硬態勢感到自豪，清楚地認識到由此而來的國內民眾支持，並且偏好逼近底線但不突破底線的戰略方針和操作方略，甚至同時站在幾條陣線上，可以得見。

四、一個處在對外政策遽變過程中的強國。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讓許多事情有了不同於先前的話語和實踐，從而使它自己和其他國家準備不足，增加困惑和誤判的可能。

其時，中美兩國之間對東亞和東南亞影響力的互相競爭，集中於中國的緊鄰周邊，與相關的海域、洋域密切相關，這種競爭關係一直在相當迅速地

演化。與先前若干年的圖景不同，大致直到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於 2017 年 1 月出任美國總統為止，中國的外交影響力和有效性一度縮減，而美國在外交和戰略陣線上頗有斬獲，即使某些只是短暫的。一方面，美國取得的成果相當程度上依靠奧巴馬 (Barack Obama) 政府在東亞和東南亞外交上不遺餘力，不失機會，爭取收益；另一方面，它們也大大受益於區域內的機會性事態及其便利，那不是由華盛頓的決策者造就，而是可以現成地利用的。這些事態主要有：日本、韓國和緬甸等國出現的政治和民眾心理變化；周邊國家面對中國快速和持續崛起 (包括其遠程軍力的大力建設和海軍活動的擴大) 而產生的憂慮、懷疑和不滿；中國與鄰國之間廣泛的領土和海洋糾紛 (全都繫於宣稱的領土主權互相衝突，隨着每個爭端國內的大眾政治、能源飢渴傾向和戰略安全意識的增長而愈益多發和可燃)；該區域內某些政府期望與中國對抗來獲得美國和國內選民的回報；中國自身在對外政策方向、外交舉動和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問題。

就這些問題而言，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數年裏，在與東亞和東南亞鄰國的關係中，中國民眾和政府的「勝利主義」顯而易見，雖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顯然較小。關於「勝利主義」，最重要、最廣泛的一個原因大概要到兩國集團 (G2) 理念的「中國版本」中去找，那是關於中國對外政策方向的一個非傳統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國對外政策精英，即中國可望成為世界第二大國，其對外政策中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是盡最大努力與超級大國美國建立穩定和大體合作的關係。儘管實際上，中國在戰略和戰略性外交方面的「重中之重」必須有兩個：對美關係與近鄰關係，而不僅僅是對美關係。

那些年裏，中國對東亞和東南亞周邊行為中的「勝利主義」還有一些其他原因，首先是持續上漲的國內大眾民族主義，透過受規制程度較小的大眾傳媒有所加強，無可否認中國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擾和制約。還有，在國家機器愈益複雜和內在多樣化的背景下，不同政府部門缺乏協調的情況有時看來頗為明顯，某些西方人士的評論相當有說服力：「軍方、重要政府部委和國有公司裏的新一代官員已開始詮釋中國如何應對國外世界」；「現在是中國政府呈現弱勢的時候。結果，種種不同的利益集團以一種不那麼協調、不那麼中央集權化的方式脫韁而出」^①。這甚至間或發生在大致由最高層高度掌管的對美政策領域方面，致使奧巴馬的高級幕僚在 2010 和 2011 年之交斷定，中國領導人雖然希望對華盛頓溫和，但「往往受權力分散的執政黨支配，與過去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時代相比，黨內將軍們、部長們和大公司既得利益者有更大影響力，對高層較少尊重」^②。

所有這些分析提示了一點：政治領導至關重要，他們的眼界、抱負、意志力、政治及戰略技能極其關鍵，即使存在國內大眾民族主義、官僚機構政治和外部環境複雜挑戰這些影響力日增的因素。中國領導人可以從他們的美國同行身上學到某些東西，後者在中共十八大前幾年裏在中國家門口贏得了一輪外交競爭。

二 「戰略軍事」和「戰略經濟」：得益與代價 (2013-2016)

自從習近平執掌中國領導權以來，有一個愈來愈可以確定的傾向，那就是他對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特別是從中國海岸到第一島鏈的西太平洋西部），無論是「軟」是「硬」的權勢上，都具有愈益增長、愈益清楚的宏大抱負；而從中長期說，這抱負無疑會影響乃至削弱美國在該區域近乎支配性的優勢。

服務於這目標的主要政策工具有兩大類：「戰略軍事」和「戰略經濟」。粗略地說，從中共十八大結束到2014年秋天為止，中國政府主要使用的是廣義的「戰略軍事」，它集中體現為：戰略軍力建設的加速突進，海上及空中戰略軍事活動範圍的顯著擴展，對美國強勢而廣泛的戰略、軍事上的競爭和對立，在釣魚台對日本的持久激烈對抗，在南海和東海爭端中的張揚和強硬姿態以及相伴的密集軍事和準軍事活動。

評估「戰略軍事」的雙重效應，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有關行動顯著地加強了中國的「硬權勢」，包括戰略軍力大幅增強，戰略活動範圍急速擴展，同時其大為增強的軍事實力有力地支撐了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領土、領海主權聲索。然而，它們也多少妨礙了中國的國際「軟權勢」，增強了中國東部周邊的戰略及外交環境的複雜性，以及與日本和美國之間的軍事衝突風險，並且作為反彈，客觀上促進了美國「再平衡」戰略的強化和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進程。以這些行動為主幹的對外戰略如果長時間延續下去，將有「戰略透支」日增的風險。

因而，很可能伴隨某種與該風險相關的戰略審視，從2014年秋天開始，中國政府實行一種有利於「戰略經濟」的戰略轉型重大決策。它基於中國巨大的經濟金融實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廣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項緊迫的國內需要，即在國內經濟增長緩慢而頑固地持續下行的嚴峻形勢下，力求增加對中國產能的境外需求。考慮到中國在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別與日本和美國達成的兩項重要安全協議，即中日四點原則共識和中美防止雙方軍艦軍機衝撞協議，就更需如此轉型。

2013年以來，無論是習近平反覆倡導並着力推進規模巨大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中國大力提倡並主導、總部設在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在2014年11月北京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表示應積極創設、範圍廣袤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還是正在大力推動或謀求開啟的「中巴經濟走廊」（CPEC）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CIM Economic Corridor），全都可被認為是「戰略經濟」方向上的重要事態。此外，還有中國政府在着力推進、面向周邊乃至世界多個地區的高鐵輸出，以及其他已經或準備投資的遠近周邊經濟項目。總之，中國政府將其對外戰略的着重點「分叉化」，使「戰略經濟」成為其優先議程上另一個重大維度。

儘管如前所述，以「戰略軍事」為主、歷時近兩年的基本方略實施有其非同小可的代價和風險，但這些後果看來並未令中國膽怯。考慮到中國對外政策存在不斷增進的複雜性，「戰略軍事」的某幾個重大方向依然重要，可見於中國基本的戰略態勢或曰戰略複合態勢之中。中國戰略軍力的急劇增強仍在繼續，甚至中國武裝力量主要在海洋和海陸兩棲環境的軍事鬥爭準備仍在加速進行。與此緊密關聯，世界已經看到中美在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軍備競爭和更廣泛的戰力競爭，涉及海上、空中、網絡空間，甚至外太空。這方面一項新的重大事態，在於美國夥同韓國，執意在韓部署將嚴重損害中國既有戰略威懾能力的薩德反導系統，而如此必將引發中美戰略武器競爭上一個重要衝突。美韓兩國政府宣布決定部署薩德系統以後，中國對韓態度和對韓關係急劇逆轉，這就表明習近平在「戰略軍事」方面的決心不可動搖，儘管大約一年前中韓關係曾被歡呼為空前的蜜月狀態。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繼續在南海大力伸張和發展自身的海洋權利和戰略權勢，特別是在南沙群島的多個島礁同時進行大規模填海擴島，並且在島上構築軍事設施。這既大大加強了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實力和地位，也加劇了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和對立，造成了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進一步緊張，而且促使美國在亞太的盟國、準盟國和其他戰略夥伴着手構建互相之間的安全合作網絡。自此，美國屢屢派遣軍艦、軍機挑釁性地前往中國擴島後的島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進入其十二海里周圍水域；中國則在南沙和西沙群島部署導彈、戰機和雷達，並且針鋒相對地出動軍艦、軍機與美國對峙。

2016年7月12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PCA）發布關於菲律賓南海訴案的裁決，全面否定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聲索和海洋權益聲索的合法性，被中國斥責為「一張廢紙」。就此，中國政府隨即發表聲明，宣告「九段線」內所有島礁皆為中國領土，這些島礁周圍的緊鄰水域皆為中國領海；「九段線」內的其餘海域皆為中國的二百海里專屬經濟區；中國的這些主權聲索和海洋權益聲索基於歷史性權利^③。為了表明中國的憤怒和決心，人民解放軍海軍三大艦隊在南海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空軍在南海的某些爭端島礁和海區上空從事態勢顯赫的戰鬥性巡航。不僅如此，人民解放軍最高級將領在PCA發布裁決之後對外宣告：中國決不會停止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因為這關係到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④。

在東海，「戰略軍事」甚或變得比先前更突出。2016年6月初，很可能是為了抵抗美國及其戰略夥伴就南海問題施加愈益強大的軍事和外交壓力（包括美軍以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為首的特混艦隊在南海的對華軍事威懾），一艘人民解放軍海軍護衛艦駛入東海釣魚島附近水域，伴隨着中國空軍軍機幾度飛臨很接近釣魚島上空的空域——中國首次就該島採取的此項軍事行動，被日本政府認為實屬罕見^⑤。這項行動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迫使對方從事某種可比喻為「兩線作戰」的行動，通過中國引發各國的「兩線作戰」。此後，很可能是為了同樣的戰略目的，中國在東海對積極干預南海問題和表態支持PCA裁決的日本施加空前的壓力。

從PCA發布裁決到10月21日美國導彈驅逐艦駛入西沙群島島礁附近水域為止，美國在長達三個多月時間裏沒有進行新的「航海自由行動」；加上中國從9月杭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開幕前夕以來，在南海未有新的重大擴島行動和部署軍事裝備措施，而且還積極從事與菲律賓改善關係的行動，因此南海局勢自2016年秋季後有明顯的緩解；但與此同時，中日在東海的軍事緊張和對峙進一步加劇，特別是中國四十餘架各類軍機集群飛越沖繩與宮古海峽之間的空域，以及日本航空自衛隊軍機緊急升空以警戒中國軍機的次數在幾個月內急劇增長^⑥。

作為「戰略軍事」的一項重要內涵，中俄兩國間的戰略和軍事協作大有進展。這是兩個重大事態——中美兩國間的戰略競爭加劇和俄羅斯與美歐激烈對抗——的地緣政治結果，促成俄羅斯加速對華輸出先進的軍事裝備和技術，還有中俄兩國海軍在地中海和日本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更重要的是，2016年6月下旬，中俄兩國元首發表〈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宣告中俄兩國實際上受到美國的威脅甚或傾覆，特別是美國主持的導彈防禦體系有違中俄兩國的聯合意志和戰略安全^⑦。9月，中俄兩國在南海進行聯合海、空軍事演習，其時南海是中美戰略競爭特別激烈、對峙最為明顯的地區。以這兩個事態為標誌，可以認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因其戰略合作和軍事內涵變得愈益突出和廣泛，一度達到或接近達到準同盟關係。

因而，可以說中國對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戰略路徑變成了一種複合性的複雜路徑，而改變「戰略軍事」為主的戰略看起來更像是個戰略擴展，並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縮。在上述「戰略軍事」的重大方向與「戰略經濟」的需要之間，有着某些不可漠視的相互抵觸，它們是中國在對外政策的內在平衡方面必不可免地要努力應對的挑戰。

最突出的問題在於，中國對外關係和政策的兩項重中之重，即對美國和亞洲鄰國的關係和政策，都在一定意義上被「鎖在」海洋戰略競爭、海洋領土爭端以及海洋權益爭議之中。遙望未來，若沒有重大的緩解或扭轉，那麼結構性的戰略競爭和戰略對立很大可能將會直接發生於中國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首先會出現在海洋上。

中國在大約短短三年半的時間裏，開闢或固化了那麼多「新戰場」或「新戰線」，但其中沒有哪一項是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決定勝負的。因此，如果這樣的狀況持續下去，那麼中國將長久地同時從事多項或多線「戰鬥」。從戰略常理來說，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局面。尤其是根據如下兩條基本軌迹，情況就可能更值得憂慮：第一，中國經濟在數年裏緩慢而頑固地持續下行，國家財政收入逐漸減少，金融風險則顯著騰升，而且這些情勢缺乏在較短時期內幡然改觀的可見前景；第二，除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社會福利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上實屬必需和不能再省的花費之外，用於軍力增進、海外擴展和國際介入的支出大為增長，而從中取得可觀經濟收益的把握頗小。做個比擬，中國的存款愈益減少，而支出卻在急劇增加，因此根本的透支風險在顯著增大。

三 特朗普上台前後中國的戰略調整(2016-2017)

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後約三年半，即從2012年底到2016年9月杭州G20峰會開幕為止，中國在東亞、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主要以種種強硬行動的張揚和擴展為特徵；從中國的視野來看，它們給中國本身帶來了利弊相兼、得失相伴的雙重效果。

然而在此期間，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前，國內外已然改變或正在改變的種種形勢，促使中國的戰略態勢和戰略行為與先前相比趨於溫和化。國內的主要形勢有：經濟增長呈緩慢而頑固的下行之勢，金融風險加劇，以及必不可少和愈益緊迫的幾大國內任務的資源支出需求大為增加。這些形勢要素使一種非常奮進的戰略態勢潛在的可持續性問題突出起來。可是更重要的是，中國與日本以及美國的軍事衝突風險，與海洋或近海鄰國關係的進一步惡化，還有因應美國戰略力量之技術更新、日本追求軍事權利和軍力增強而出現的「回火」(backfire)效應。不僅如此，隨着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出任菲律賓總統，菲律賓的對外政策急劇變化，對華態度大幅改善，從而「迫使」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需多少變得溫和化^⑧。

可以認為，以上種種對中國在東亞、西太平洋的戰略行為造成了溫和化的影響。重要的是，大約在杭州G20峰會開幕前夕，中國在南海的戰略態勢開始「軟化」，這是自兩年前分別與日本和美國達成安全協議以來所未見。中國政府開始積極地改善與菲律賓的關係，特別是在杜特爾特2016年10月訪華期間，中國對菲許諾超過百億美元的經貿援助^⑨。九個月後，連一名曾稱南海的相對平靜帶「欺騙性」的西方學者也不能不承認：「中國在過去一年一直對其他聲索國的利益採取了較為和藹的態勢，同時似乎不再搞軍事挑釁。不僅如此，自那時以來中國政府沒有正式講過『九段線』……它讓菲律賓漁民進入他們在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即黃岩島]的傳統捕魚區，該水域長期以來是一大爭奪對象。」「過去十二個月未見中國與各沿岸國的任何衝突，而北京的言辭一直是和解性的。」^⑩

然而，就中國戰略態勢的溫和化而言，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被視為轉捩點，因為這令中國政府產生了嚴重的憂慮和恐懼，主要是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就中國貿易行為和慣例數度發出空前強烈的威脅性言辭造成。如果他把这些言辭轉變成真實的美國政策，就會破壞中美經貿關係，從而嚴重損害中國的經濟和金融穩定。不僅如此，他蓄意逼近和觸碰中國的台灣問題底線，在當選後不久便與台獨傾向根深蒂固的台灣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經過密集和深入的調查後迅速披露，那出自特朗普外交和安全核心團隊的長時間精心策劃，並得到特朗普的首肯：「這次歷史性的通話——美國領導人與台灣領導人之間自1979年以來的首次通話——是特朗普的顧問針對與台灣接觸的新戰略，在幾個月內悄然準備和謀劃的產物」，「是一項蓄意的挑釁行動，着力顯示即將上台的總統背離往昔」^⑪。更有甚者，特朗普隨即公然聲稱：「我不懂為甚麼我們必須受『一個中國』政策

束縛。」這至少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所說，表明「他認為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外交關係的中心基礎——人們所稱的『一個中國』政策——已到了該被重新審視的時候」^⑫。他明確示意要將美國這項自1979年以來的傳統政策當作可以捨棄的討價還價籌碼，迫使中國在朝鮮和貿易等問題上作退讓。這當然令中國嚴重不安。可以說，中國生成了一種強烈的憂懼，擔心特朗普非常反華，鼓吹冒險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或曰玩世不恭)。

這樣的憂懼幾乎立即產生了政策效應：習近平在應對特朗普方面採取極其耐心和審慎的做法，僅僅在台灣和「一個中國」這個核心問題上才公開表現出毫無疑問的堅定，明確聲明「一個中國」原則不可談判：「無論是誰或出於甚麼目的，如果試圖破壞一個中國原則，或者幻想將此作為交易籌碼，必將遭到中國政府和人民以及國際社會的堅決反對，最後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⑬此外，中國政府採取和堅守一種純反應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後才決定是否做反應、在甚麼時候做反應和做怎樣的反應，並且從不公開對他進行官方的指責。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盡最大努力，去尋找和開發與特朗普團隊某些顯要成員的有益聯繫。總之，耐心、審慎、只針對最核心威脅的非常堅決的公開抵抗、純反應式方略、尋求和開發有益聯繫，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中國政府應對特朗普的一種處理意外緊急狀態似的戰略。

這個戰略很快證明頗為成功，從而成為中國近十年間較精彩的對外戰略決策之一。2017年2月初，特朗普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改變態度，正式認可美國傳統的「一個中國」政策，這必然大為增強了習近平對「搞定」特朗普的信心^⑭。不過，在初步心理認知上，「搞定」大概是雙向或「互惠」的：習近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在朝鮮問題上與特朗普達成空前的合作。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不久後特朗普就似乎多少不經意地給中國帶來意外的非凡愉悅，特別是4月初中美首腦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會晤中好得令人驚訝的氣氛。緊隨其後，特朗普不止一次公開盛讚習近平是強而有力的、友好的世界級大國領袖，那進一步地促進了中國戰略態勢的溫和化^⑮。

四 中國戰略態勢的全面溫和化(2017)

在特朗普治下美國介入全球(外交、戰略)事務的意願和態勢雙雙收縮的背景下，實力已大幅騰升的中國展示出參與引領世界的宏願，為此近乎全面地呈現出在東亞和西太平洋的溫和化態勢。從戰略上說，這種溫和化的性質應被視作延宕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式「勝利的頂點」(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⑯，或用通俗話說：「好日子拉長着過」，因而對中國的長遠總體利益來說甚為可取。

首先必須密切注意，與過去相比，中國政府對朝鮮加速研發核導彈的態度變得空前嚴厲，在很短的時間內施加了那麼多懲罰，是先前的中國領導人從未願意或敢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出於爭取良性的中美關係和維護世界核

不擴散體制。不僅如此，除了前述中國在南海行為的溫和化，中國政府還更積極地力圖改善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及其成員國（特別是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關係，加快與東盟協商「南海行為準則」，以便穩定海上局勢和增強中國的外交影響力。還有，在海湖莊園中美會晤以後的幾個月裏，出於對美關係考慮，中國方面顯然沒有像往常那樣公開強調中俄戰略及軍事合作，即使在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於2016年5月與習近平會晤時亦是如此；與此同時，中俄兩國首次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敘利亞問題決議案表決時投票意向有異（中國投棄權票，俄羅斯投反對票）^①。

也大致同時，中日關係出現顯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變原先立場，做出肯定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明確表示之後，習近平於2017年5月16日會見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指出中日雙方應在已簽署的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基礎上改善兩國關係。不足兩周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在東京附近的神奈川縣舉行數小時會談，提出當前中日關係既面臨新的機遇，亦存在突出挑戰，日方在歷史和台灣問題上應言而有信，按規矩辦事，在南海問題上則應謹言慎行^②。可以認為，只要中日兩國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確定的外交軌道，兩國間多年未有的正式最高級別互訪和會晤，在不久的未來很有可能實現。

在2017年10月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中國東亞、西太平洋戰略態勢的溫和化不僅繼續下去，而且得到加強。在可預見的未來，就中國對外政策而言，這可能意義重大。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曾因為南海問題而急劇跌落到鄧小平和李光耀時期後的最低點^③，但從2017年9月起由於新加坡政府實質性地收斂了與台灣的軍事交往，在南海局勢有所緩解的形勢下，不再像先前那樣在此問題上站在美國一邊，兩國關係因而漸見改善。不僅如此，同年8月底，中國與印度經過複雜的談判，從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邊境洞朗地區各自後撤部隊，結束持續了兩個多月的嚴重軍事對峙。據信，中國還後撤了在那裏建造戰略公路的推土機，建造該路在先前引發印軍越境盤踞^④。10月30日，中韓關係持續嚴重緊張的局面也開始改觀：中國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閉幕後幾天，將在韓部署薩德系統與中韓關係中廣大和多樣的其餘方面「脫鉤」，實際上放棄了一項大約施行一年半但無直接效果的外交政策^⑤。中國，一個被普遍視作正在冒起的超級強國，在很大程度上因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傾向而取得歷史性機遇；它願意對周邊較弱勢國家做出實質上單方面的重要讓步，這本身就令人真正地「心頭一亮」。

然而，形勢從不完美，探索永無止境。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對外戰略的首要困難是在朝鮮問題上。這問題由於三大事態而變得緊迫和危險：第一，朝鮮異常頻繁地從事中遠程導彈試驗和熱核子試驗，技術上幾乎節節躍進，爆炸當量騰升；第二，美國特朗普政府及其東北亞盟國，接連以空前力度對朝鮮發出軍事打擊威脅，雖然韓國政府自文在寅總統在2017年12月中旬訪華後有明顯的收斂；第三，聯合國安理會幾乎接連通過愈來愈廣泛和嚴厲的對朝經濟制裁決議，特別是2017年9月11日和12月22日分別通過的兩項最新制裁決議。

與此同時，中國在朝鮮問題上近乎十五年的困境加劇到異常嚴重的程度，其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關係受到嚴重威脅或實際損害。一貫堅持並努力謀求朝鮮半島穩定和平的中國為何連連受挫？坦率地說，中國旨在爭取和平穩定以及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對朝影響力，被同屬中國對外政策的一個成份所抵消，那就是中國愈益廣泛和嚴厲的對朝經濟制裁，而這倒轉過來正促使朝鮮愈益對華反感。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證據就是特朗普政府大違中國所願，不斷且愈益激烈地發出對朝軍事打擊威脅，並且持續地施加壓力，要求中國參與對朝經濟制裁。至於中國對韓國的影響力則在2017年10月底中韓達成協議之前也被部分抵消，由在韓部署薩德系統引發中國延續一年多的事實上的對韓制裁。

五 結語

中共十九大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新時代。可以肯定，十九大以後，考慮到五年以來國際情況的轉變，中國對外政策方向較長期地說將以三個「更為大力」為特徵：第一，更為大力地拓展和深化中國對全球政治經濟和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包括選擇在某些領域謀求中國的引領角色；第二，更為大力地爭取中國在亞洲大陸甚或更多區域的經濟和外交優勢，與此相連的是選擇在某些地區或要點上促成戰略存在或影響；第三，更為大力地爭取確立中國在西太平洋西部的戰略及軍事優勢。

放眼全球，比較中外，可謂中國大治，美國、西方和世界某些地區大亂，世界秩序變動不定，世界形勢除上述兩個基本狀態外大致撲朔迷離。因此，長期來看，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線，繼而守住底線，首先將中國國內的事情辦好，繼續提升中國的實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以高品質發展為綱，爭取實現中國國家力量和社會健康的重大提升，從而為世界秩序的進步性轉型提供最重要的積極條件。然而，謀遠求近，不盡可能恰當地應對當前的重大緊急狀態，就談不上能爭取美好的未來。很明顯，這樣的緊急狀態當前唯有朝鮮問題，因而至關重要的是眼觀全局和化繁為簡，以便概覽和透視這個問題的基本形勢，並且相應地調整戰略和政策。

註釋

① John Pomfret, "Dispute with Japan Highlights China's Foreign Policy Power Struggle", *The Washington Post*, 24 September 2010.

② David E. Sanger and Michael Wines, "China Leader's Limits Come into Focus as U.S. Visit Nears", *The New York Times*, 16 January 2011.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聲明〉(2016年7月12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2016-07/12/c_1119207706.htm。

④ 〈吳勝利強調南海事關執政基礎 境外媒體：中國妥協無可能〉(2016年7月21日)，參考消息網，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0721/1239441.shtml。

- ⑤ Ayako Mie, "First Chinese Warship to Skirt Senkakus Triggers Protest from Tokyo", *The Japan Times*, 9 June 2016.
- ⑥ 初曉慧：〈日媒：日戰機全年度緊急升空或超千次 七成針對中國〉（2017年1月21日），環球網，<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1/9995715.html>。
-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2016年6月26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6/c_1119111895.htm。
- ⑧ 參見一項較早的正確預料：Jane Perlez, "Prospect of Philippine Thaw Slows China's Plan in South China Sea", *The New York Times*, 24 September 2016。
- ⑨ Tom Philips, "Has Duterte Really Ditched the US for Beijing's Embrace?", *The Guardian*, 21 October 2016.
- ⑩ Benoit Hardy-Chartrand, "One Year after the South China Sea Ruling, a Deceiving Calm", *The Japan Times*, 16 July 2017.
- ⑪ Anne Gearan, Philip Rucker, and Simon Denyer, "Trump's Taiwan Phone was Long Planned, Say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The Washington Post*, 4 December 2016.
- ⑫ Jane Perlez, "If Donald Trump Pushes on Taiwan, How China Could Push Back", *The New York Times*, 12 December 2016.
- ⑬ 這是特朗普上台後中國政府唯一公開的對特朗普的威脅，屬於極為乾脆和最有份量的拒斥。參見〈外交部發言人：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可談判的〉（2017年1月16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6/c_129449198.htm。
- ⑭ Jane Perlez, "Trump, Changing Course on Taiwan, Gives China a Upper Hand", *The New York Times*, 9 February 2017.
- ⑮ "Trump, Xi Eye on Mar-a-Largo Summit", *Daily Mail*, 17 March 2017.
- ⑯ 「往往，即使勝利也有個頂點……因此，所有戰役規劃的自然目的都是要達到一個點，即進攻轉變為防禦的轉捩點。如果要超過這個點，這就不僅是一種無用的努力，不可能勝上加勝。它事實上還將是一種有害的努力，將導致反作用……正確地估算這個點至關重要。否則，一個進攻者可能所取多過他所能管控的，猶如負債似的。……大多數將領所以會寧願遠未達到自己的目標就止步不前，而不冒險靠它太近，原因就在於此：那些有大勇氣和大幹勁的人所以往往會做得過頭，原因也在於此。只有能夠以有限手段取得偉大結果的人，才真正贏得了成功。」參見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時殷弘譯：《戰爭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817、824、827、828。
- ⑰ 〈習近平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2017年5月14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514/c64094-29274031.html>；〈安理會有關敘利亞化武決議草案遭否決〉（2017年4月13日），大風號，<http://wemedia.ifeng.com/12582136/wemedia.shtml>。
- ⑱ 〈習近平會見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2017年5月16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6/c_1120980107.htm；〈楊潔篪說日本在歷史和台灣問題上應言而有信〉，《聯合早報》，2017年5月30日。
- ⑲ 更有甚者，新加坡總理在2016年8月初訪美期間公開宣稱，PCA關於菲律賓南海訴案的裁決「強而有力」，應得到有關各國接受。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美期間表示海牙仲裁法庭裁決強而有力〉，《聯合早報》，2016年8月6日。
- ⑳ Simon Denyer and Annie Gowen, "Who Blinked in the China-India Military Standoff?", *The Washington Post*, 30 August 2017.
- ㉑ Jane Perlez, "China Blinks on South Korea, Making Nice after a Year of Hostilities", *The New York Times*, 1 November 2017.